

“忠实的女仆”还是“灵魂的伴侣”

——从丽娜和许露丝的婚姻看妻子角色

王薇薇

(广东商学院, 广东 广州 510320)

【摘要】谭恩美在《喜福会》中通过对华裔女儿这一代的失败婚姻的描写,展现了男权文化对女性根深蒂固的影响和压迫以及女性对此的反抗和斗争的精神。也表明了不管是在东方还是西方,幸福婚姻的追求一直是个亘古不变的话题。本文以丽娜和许露丝的婚姻为切点,试探讨第二代华裔女性如何在婚姻中寻找属于自己的位置。

【关键词】《喜福会》;妻子角色;女仆;灵魂伴侣;寻找位置

【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0)03-0076-04

《喜福会》是美国华裔作家谭恩美的成名之作。小说描写了四位性格、命运各异的中国女性抛却国难家仇,移居美国,以及她们各自在美国出生、成长的女儿的生活和婚姻经历。而女儿们的经历尤为令人关注,源于女儿们的特殊身份。

《喜福会》中的女儿们,是第二代美籍华人。从小,母亲就用中国的准则去要求她们,并且母亲身上散发的东方气息也无时无刻不使她们“耳濡目染”,这使她们无法摆脱东方的男权思想的影响;再加上社会又将她们排挤在“少数民族”之列、正宗的美国人之外,这种偏见甚至影响了她们的婚姻。这种双重身份导致她们时常对美国式的家庭生活方式束手无策,迷惑不已,从而导致婚姻危机甚至完全的失败^[1]。然而,她们经受一个异常痛苦的蜕变过程后,最终还是在一片“异土”上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位置。

《喜福会》这部小说中包含着大篇幅的、绘声绘色的黄白结合中文化差异的描写。并对第二代在美国出生成长起来的华裔女性婚姻以及妻子角色的扮演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和刻画。本文以许露丝和丽娜两人的婚姻以及扮演妻子角色中所受到的文化冲突为代表,探讨不同文化对妻子角色的要求是否有本质上的不同或是最后殊途同归。而她们又是怎么样在双重文化的夹缝中为自己的幸福找到出路的。

一 旧社会东方男权下的女仆

许露丝和丽娜虽然从小就认为自己是美国人,但是,她们却有着天生的容忍、温顺和相信命运。而她们这些性格其实都是因为从小受到她们中国母亲的影响和耳濡目染。在中国,男性是个体家庭的中心,男人到处显示着他的主体意识,而女人多年来只是从事着生产和服务于人的生活——生人、

养人、服侍人,弱化了人的主体意识,人生的价值湮没于盲目的自我奉献和服务于家务劳动中^[4]。因此,多年来她们学会了忍气吞声、服从于命运、唯丈夫为首。在家里的任务就是服侍丈夫,就像个忠实的女仆一样听话。虽然母亲们经过努力摆脱了中国那段失败的婚姻,“有了独立于世的能力,却缺乏自主自立的意识,在思想精神上特别是感情上,仍然停留在过去”(于东晔,2006:30)。

《喜福会》中的中国母亲和所有的当时的中国妇女一样,也有着多年来的男性社会思想精神枷锁。她们不但自己受害,还用这些准则要求自己的女儿。正如波伏娃在她的《第二性》里说:“母亲被牢牢固定于家庭,固定于社会,她遵守法律和习俗。”的确,在《喜福会》中“母亲的苛求代表的就是男性的苛求”^[10],她们把自己固定在传统的角色中,还要求自己的女儿去完成和她们一样使命。

像丽娜·圣克莱尔的母亲顾映映,就一直认为“女人是阴,注定只能冷却自己的热情,男人是阳,夺目耀眼,女人只有借助男人,才有光彩。”^[11](65)]。所以,她到了美国也依然保留着那种中国的“三从四德”和以丈夫为中心的思想。甚至当她的丈夫多年未经她同意一直乱翻译她的话,置她于失语状态。对于男权文化的侵蚀,她不但忍气吞声、不反抗。她还作为“帮凶”,继续用千百年来男性文化为女性所规定的意识来内化女儿的自我意识。首先,她通过用东方的那套言行、故事来束缚着女儿的行为。她为了让女儿听话吃干净碗里的饭,就用东方迷信的说法来警告女儿丽娜,来束缚她的行为。然而,映映的女儿丽娜虽说是接受美国的文化——独立自强,但是,骨子里却和她母亲以前一样软弱,连她的母亲都说“她和我共一个身子,共一个思维的”^[11]

收稿日期:2010-04-29

作者简介:王薇薇(1985-),女,广东湛江人,广东商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216)。因此她明明认为爱是不能通过AA制来维持的,不喜欢她丈夫的这种斤斤计较的生活方式,不喜欢五五分账、锱铢必较的性格,她也默默忍受。不仅如此,一如丈夫克利福德一直替映表达思想,不管对错;同样丽娜也一直让哈罗德概括他们婚姻“平等”的意义,不管是不是。由此可以看出,母亲的逆来顺受的性格和宿命论的情感相互交织在一起,深深地影响着她,使她下意识地消极地接受婚姻中的不平等和不美满。

许露丝的母亲许安梅是“中国方式长大的”,从小开始就“被培养成清心寡欲,吞下别人栽下和自己种下的苦果”。虽然她完全采取另一种相反的方式教育她女儿,“但是可能因为她是她(许安梅一笔者注)生的,而且,她又恰巧是个女孩,因此,她身上,还是显示出那种东方女性的优柔寡断”^{[1](195)}。不仅如此,女儿许露丝还深受她母亲家训的影响。安梅的母亲的第一条家训是“忍声吞气”,但这条家训先害了安梅母亲,后害了安梅,接着又害了许露丝。因为这种“忍声吞气”已经成了一种女性间的“集体无意识”。就连许露丝自己也这么认为,“我对妈妈,一直是盲目的信任,她说什么我都深信不疑,即使我一点都不理解她讲的”。因此,安梅无意间又将这条母训传给了女儿。“安梅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反思,说道,虽然她让女儿捍卫自己,可女儿还是走了自己的老路”^[9]。而文中也表现出,女儿露丝和特德在一起后开始就把自己当成“孱弱的女子”,婚后她更是被放置在听从者和顺从者的位置。最后,他丈夫要与她离婚时,她既不询问原因也不愿去尝试挽救她的婚姻,就整天把自己封闭在家里坐以待毙,等着丈夫来收回房子。因为一直以来她只会扮演“忠诚女仆”和弱者的角色,没有主见和反抗。这也就是说她一直深受母亲这个代表着旧社会男权思想的影响和角色定位,一开始就把自己定位成对丈夫言听计从的弱者。

由此可看出,她们母亲那一代在婚姻上扮演的角色仍是个忠实的女仆,她们不仅是家庭的忠实女仆,还是旧社会东方男权制度下的忠实女仆。虽然她们经过反抗从第一段婚姻中逃离出来,但是,东方男权社会的思想还是深深地渗透在她们们的深层意识中,是一种可怕的集体无意识。因为“传统的文化对女性的在爱情、婚姻中的角色规定就一直是要求女性要无私、忘我和牺牲”^[5]。而作为母亲她们不但扮演着男权社会中既定的角色,还要拿这个标准去扭曲和规范她们的女儿。而母亲的苛求归根到底就是当时这个社会男性对女性的苛求。因此,

像丽娜和许露丝这样的第二代华裔美国人,与其说是在潜意识中受到母亲言行的影响和规范,不如说是受到旧社会东方男权思想的侵蚀和束缚。

二 掩盖在西方“众人平等”下的女仆

美国,一个众人都认为是民主与自由的国家,时刻宣扬着人人平等,男女平等。进入美国社会的华裔女性,在这个大文化背景下也接受着关于女性自强、平等之类的先进意识。而事实上,华裔女性在美国婚姻中的情况到底是如何的呢?

其实,仔细看看许露丝就清楚。虽然西方一直宣扬民主和人人平等,但是,在这“人人平等”下仍存在男权主义,只不过它为男权主义穿了一身虚伪的“平等”的外套。

就如许露丝的婚姻,虽然特德口口声声说家里的事情会和她商量,希望她有主见、作为他的灵魂伴侣。但是,“好多年过去了,总是特德来决定,我们(许露丝和特德一笔者注)去哪几度假、他决定需要添哪些家具、他决定我们暂时不要小孩”等等^{[1](101)}。“开初时,我们还会相互谈论一番,待我们明白讨论的结果,总不外乎是‘你看着办吧,特德’,‘你决定吧,特德’”^{[1](101)}。因此,在西方民主的掩盖下,仍深藏着男权主义的思想。许露丝知道不管所谓的讨论进行怎么样,结果不外乎都是她的丈夫决定。尤其是,当特德给病人治病失败后,所有的自信和责任感都没有了。他开始无休止地逼迫许露丝做决定。但是,由于许露丝长期习惯了受男权中心文化的压迫,已经变得像木偶一样完全没有主见了。因此,当露丝还是像以往一样时,特德便责备她“不承担一点责任”。这表面看起来特德是希望许露丝成为他的灵魂伴侣,在家庭里和他一起承担和面对一切。事实上这是他的男权思想在作怪,是一种虚假的平等。由于治病失败,他在爱人以及其他的人面前无法体现他作为白人和男性的优越地位。所以,就通过这种责怪伴侣和“制造事端”的方法来体现他的优越地位,用这种方式来掩盖男权中心主义对女性压迫的本质。事实上,许露丝并没有成为他真正平等的灵魂伴侣,而只是他随心所欲支配的女仆。在他不需要时应该沉默,需要时就应该站出来帮他。其实,这在本质没有变,变的只是形式更掩盖了而已。

丽娜,是一位很有事业心的女性,她在事业上 and 丈夫哈罗德一样对公司有贡献。但是,却只拿和哈罗德工资的七分之一那么多,而且她为他工作那么多年都没得到应有的晋升。哈罗德还要拿什么不能用人唯亲的借口来掩护。不但如此,哈罗德还主张“要一直保持各自在金钱上的独立,我们(哈罗

德和丽娜(笔者注)互相的爱,即会得到最大的保障”。因此,哈罗德一开始就主张要平分账单,不管丽娜是不是只点一个沙拉,都要平摊所有费用,生活上的费用计算也是如此。虽然,女权主义一开始是主张男女经济上平等,但是,像哈罗德这种斤斤计较的费用平摊不是真正的平等。正如陆薇(2007)所说:这锱铢必较的平等是用来“掩盖问题的本质——那就是更隐藏、更根深蒂固的男权主义思想定式和人们早已习焉不察的男权观念。”^[1]。而《喜福会》中对丽娜的描写也体现了这一点:有好几次“不,我(丽娜—笔者注)都想从心里发出抗议。我想大声对他说:不要这样。实在不满意我们目前这种钱财的‘井水不犯河水’,分得一清二楚的做法”。但是,这只是丽娜在心里的抗争,却没有最终说出口。由此可看出“男权观念灌输给女性的沉默和忍让的‘美德’令丽娜有苦难言,把她推入了一个无言、无奈、无望的境地”^[1]。沉默成了这个弱势群体唯一可以表达的方法。

哈罗德想通过这种在金钱上平摊的方式来体现丽娜完完全全是他的精神伴侣,宣扬金钱会玷污他们的爱情的理论。这种钱财上平摊既是男女平等的理论,置丽娜于有苦难言的境地。其实,归根到底这只是他用所谓男女平等的名堂来掩盖他剥削女性的事实。

因此,就算是在美国,这个人人都认为是自由和平等的国度,妻子扮演的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灵魂伴侣”的角色,而是掩盖在平等、民主下的另类女仆。她们并没有受到真正的平等对待,仍然会受到男权文化的影响。暴露了西方的男权文化虽然没有像东方的那样明目张胆,但是,它们仍然无时无刻不在,只不过他们的行为和方式更加隐蔽了而已。

三 灵魂伴侣的真正意义

真正的灵魂伴侣是建立在人人平等的基础上、是相互知心的人生伴侣,不管是建立在任何性别、任何种族上。可是,《喜福会》中的女儿们,不管是丽娜还是许露丝,一开始都没有在婚姻上得到平等的对待。她们所扮演的妻子角色都算不上是灵魂伴侣。

《喜福会》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人人都认为民主、自由、平等的美国,只不过是白人男性的天堂。“难怪美国人这样不无幽默地调侃:‘美国人人生来平等,只不过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平等。’”^[1]。像丽娜和许露丝这样的第二代美国华裔,接受着地道的美国教育,起初就天真地认为美国就是一个可以享受人人平等的地方。身为华人女性,在婚姻中她们既受到来自白人丈夫的男权文化的压迫;作为第

二代的华裔女儿,她们还深受母亲所代表的东方男权思想的影响。这种双重压迫使她们徘徊在主流文化的边缘,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

最后,她们了解和理解了母亲,并在其帮助下,正视了自己身上拥有着东方血液和元素的事实。她们不再一味地讨厌母亲说的那一套,而是吸取教训,结合自身的因素,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灵魂伴侣的真正意义。

文中上述的内容表明了即使在不同的国度,妻子的角色仍具有相同本质。女儿们的婚姻以不同的结果来结局,也说明了想要在婚姻中真正得到平等,就要明白灵魂伴侣的真正含义。而真正的灵魂伴侣是能够处处平等、人人平等,不论建立在任何性别、任何种族的基础上。

小说中,以女儿们用不同的方式去寻找真正的幸福来结尾,体现了灵魂伴侣的真正意义。对于一开始就预示破裂的、无法挽救的婚姻,丽娜也不再忍让,“像虎一样站起来为自己和生活斗争”,既然当不了丈夫的所谓“精神伴侣”,也不再沉沦于女仆角色,勇于结束这段“貌合神离”的婚姻,给自己一个解脱。和丽娜的结局相反,许露丝反而因为大声吼出来,不再“优柔寡断、患得患失地犹豫”,让她丈夫正视了她的存在价值,不敢随便就把她从他的生活中除去。最终挽救了她的婚姻。这时的她不再是女仆,而是婚姻的主人、丈夫的真正灵魂伴侣。

如何扮演好妻子这个角色,从古至今、从中到西,都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而“女儿妻子形象”又是谭恩美小说中一个重要的群体,因为她们不只是受到来自东方男权文化的侵蚀,同时还受到来自西方种族和男权文化的排挤,令她们身处夹缝的境地。

她们可以抵抗着来自东方赤裸裸的男权文化的压迫,但是,却忽视了来自西方隐蔽的、掩盖在所谓的平等下男权文化的一步一步的威胁和吞噬。她们以为在美国这个国度上结合的婚姻就会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可以顺理成章成为对方的灵魂伴侣。谁知道也只是在一个掩蔽在平等下的女仆而已。不过,最后对双重身份的正视和对婚姻生活的明确,使她们重新为妻子角色进行了定义和诠释。最终,寻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位置。

这也许是谭恩美小说中塑造华裔妻子形象的意义之一。她们既不要当家庭的女仆,也不要当西方平等下的另类女仆。而是通过找到灵魂伴侣的真正含义,重新定位自己的位置,为自己的幸福寻觅新的方向。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 谭恩美. 喜福会[M]. 程乃珊, 贺培华, 严映微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 [2] 顾向阳. 《喜福会》中美国华裔女儿的灵魂之旅[J]. 大理学院学报, 2009, 9.
- [3] 程乃珊. 喜福会·母女情深——《喜福会》译后感[M].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 [4] 丁子江. 中美婚恋的性学分析[M].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4.
- [5] 于东晔. 女性视域: 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文学女性话语[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 [6] 杨春宇. 《喜福会》中的东西方背景下东方女性婚姻价值观试析[J]. 才智, 2009, 31.
- [7] 曹雯. 在优越感与自卑感中挣扎的华裔女性——《喜福会》中的女儿形象[J]. 黄石理工学院学报, 2008, 6.
- [8] Amy Tan. The Joy Luck Club[M]. Ballantine Book. 1989.
- [9] 谭恩美. 喜福会[M]. Selena Ward 导读. 胡向华译.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2003.
- [10] 刘慧英. 走出男性的藩篱——文学中的男权意识[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6.
- [11] 陆薇. 走向文化研究的华裔美国文学[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 [12] 西蒙娜·德·波伏娃. 第二性[M]. 陶铁柱译. 中国古籍出版社, 1998.
- [13] 王芳. 《喜福会》的女权解读[J]. 安徽文学, 2008, 2.

“Loyal Servant” or “Soul Mate”

——A Study of the Role of Wife in Lina and Rose's Marriages

WANG Wei-wei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Business Studies, Guangdong, Guangzhou 510320)

Abstract: *The Joy Luck Club* by Amy Tan describes the failed marriage about the American-born Chinese daughters, showing that the impact of the deep-rooted patriarchal culture and the depression on the women and their spirit of resistance and struggle. What's more, it also shows that no matter where it is, in the East or West, pursuit of happy marriage has always been a constant hot topic. The paper aims to analyze how Lina and Rose, who stand for the second American Chinese women generation, and find out their true happiness.

Key words: *The Joy Luck Club*; Role of Wife; Servant; Soul Mate; Real Place

(责任编辑: 张俊之)

(上接75页)

Dramatic Rhythm in *Death of a Salesman*

LIU Hui

(Foreign Language College,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00715)

Abstract: *Death of a Salesman* is considered as a modern classic of the American theater and modern literature. Most critics pay much attention to the analysis of the plot, theme, Arthur Miller's theatre theory and creative expression. However, little has been done to link the themes of this play with its technique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theme and techniques in *Death of a Salesman*, and tries to provide a stylistic analysis of *Death of a Salesman* through the examination of the ways in which the rhythmic organization of the play is managed in respect of characterization in the play; and tries to prove that the focus of the unifying rhythm of *Death of a Salesman* is the theme of the loss of control by the protagonist over the world in which he lives.

Key words: *Death of a Salesman*; Theme; Dramatic Rhythm

(责任编辑: 张俊之)